

语文教师
成长丛书

巢宗祺 总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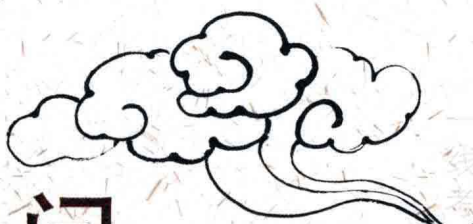
历史追问： 语文教育发展篇

徐林祥
武玉鹏

主 编
副主编

语文教师
成长丛书

巢宗祺 总主编



历史追问： 语文教育发展篇

徐林祥
武玉鹏

主 编
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徐林祥主编.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语文教师成长丛书/巢宗祺主编)

ISBN 978-7-5328-5973-3

I. 历... II. 徐...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9551 号

语文教师成长丛书

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

徐林祥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22.5 印张

字 数: 37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5973-3

定 价: 37.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简介

徐林祥 男, 1956年生, 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史、中国美学史、中国美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专著有《中国美学初步》、《中国美育史导论》, 主编有《刘熙载美学思想研究论文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语文教师继续教育指南》、《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初中语文课外阅读达纲速成》、《高中语文课外阅读达纲速成》、《顾黄初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红楼梦选读》、《红楼梦选读教学参考书》等, 参编苏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以及其他著作多种, 发表论文近百篇。

武玉鹏 男, 1955年生。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及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作有《名师研究——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思想》、《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第1辑)》、《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第2辑)》, 主编有《语文教师专业技能训练和教育实习》,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师三等奖。

序 言

巢宗祺

山东教育出版社为帮助语文教师提高专业修养，策划编写一套语文教师成长丛书，约我参与做点事。我当然乐意，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给自己补一点课。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位老师批评我。他说，在网上查过有关我的资料，从经历来看，我对于语文教育很不专业。他说的没错，我确实不是语文学科教学方面的行家，我在许多场合坦白过自己的经历。受委派参与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在这方面能取得一些成果，全靠多方面专家组成的团队的合作。在参与课程改革工作之前，我也曾发表过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看法，那时主要是凭自己当学生时学习语文的体会和当教师时所获得的一点经验，都是在学习和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感性认识；此外，还有在研究语言问题中的一些理性思考，支撑了我对语文教育问题的认识。近几年，卷入到语文课程改革中，我不能不做些努力，在教育理论及语文教育实践方面加强进修，想尽量使自己在这方面变得“专业”一些。如今跟随朋友在这套丛书的编写中做点事，也是我的一种专业进修。

这套丛书共有四册，刘正伟教授主编的《名家解读：语文教育意蕴篇》，曹明海教授、史洁副教授编著的《名师透视：语文教学智慧篇》，徐林祥教授主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高伟毅先生、刘淼教授主编的《一线考察：语文优质课例篇》。这四册书有对语文教育内蕴的理性解读，也有对语文教学智慧的感性透视；有对古今语文教育思想发展脉络及要义精髓的剖析，也有对当代语文名师教学实例及其内蕴智慧的再现与反思，还有著名学人以“局外人”眼光对语文教育教学的“门外”解读和撞击。依我之浅见，这套丛书将有助于语文教师拓展学术视野与思维空间，在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实践中重建教学秩序。我在读稿中深切感受到，这套语文教师成长丛书，从不同角度为语文教师提供了实实在在、有滋有味的“精神大餐”。《名家解读：语文教育意蕴篇》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对语文教育本性特质的深层解释和独到描述，揭示了语文教育的真义和特有的规律。《名师透视：语文教学智慧篇》则对全国卓有影响的语文名师的教学智慧做了全新的透视，可谓写尽了语文名

师教学智慧的美丽。这些语文名师在语文课程改革的第一线一直痴心探求着“教学的真义”，守护着一颗纯美的“教学的大心”。他们的教学探索，既带有一种对语文本体生命形态的思索，又把根深植于文化与心灵的主体世界之中，通过语文课堂景境的开采和生发，着力于学生情感的陶冶、精神品格的提升和心灵世界的熔铸。《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则把语文教育的思索探入到语文教育的民族历史长河里，追问语文教育的一系列引发我们现实思考的历史事件，引导我们深入考察语文教育永不停息的发展轨迹。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在语文教育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定能获得深刻的语文教育当代思考和启迪。《一线考察：语文优质课例篇》又别有情致和意味，把我们导引到了语文教学改革实践的一线前沿，让我们目睹了丰富多彩的语文优质课例，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一线语文教师教学改革的热情和投入精神。实际上这些来自于语文教学一线的优质课例，正是广大一线语文教师进行教学设计的最好借鉴。

参与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对我本人无疑是有帮助的。然而我又十分犹疑，因为没有给我分配具体的编写任务，而是让我看全书的稿子，还要做“总主编”。我对于语文学科很不专业，而戴上一顶“总主编”的帽子，不免感到有些“头重”，因此我曾想退缩，有些事就一直僵持着。如今书马上就要开印了，编辑着急，频频催稿，一定要我写几句话，我惟有老老实实说说真实的过程和自己的心情。眼下脱不了这顶帽子，只得随人耻笑了。不过，我边读书稿，边做笔记，还真是有了不少收获。

引言

徐林祥

中国语文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随着华夏文明的诞生，口头语言的出现，便有了最初的口口相授的语文教育。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社会的教育没有从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分离出来，因而也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课程与教学。但在原始宗教祭祀、原始艺术（歌唱、绘饰、雕刻等）、原始记事（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原始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中，已有不少语文教育的内容。

大约夏代初期，最早的成形文字出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标志文字发展成熟定形。文字的出现，使书面语文教育成为可能。在原始记事符号发展为成熟文字的过程中，已经孕育了早期的文字教育，并促成了利用文字进行教学的学校形成。奴隶制的诞生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文字教育成为奴隶主阶级的专利，教师逐步成为一种职业。

夏、商的学校教育已有文字的认读、刻字等内容。西周的学校在夏、商的基础上更加完备。西周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已类似今天的课程门类教育。礼，包括政治、道德、历史的教学内容；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的教学内容；射，包括射箭、投掷的教学内容；御，包括驾车、骑马、习战的教学内容；书，包括识字、写字的教学内容；数，包括算术、计算的教学内容。“六艺”的教育中包含着相当多语文教育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学在官府”转变为“学在四夷”。“士”阶层的兴起打破了卜史的文化垄断，出现了文化下移、私学兴起的局面。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孔子办学，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文、行、忠、信”，开设的具体课程主要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使用的教材主要有《诗》、《书》、《礼》、《乐》、《易》和《春秋》，教学方法有因材施教、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和启发式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教育，以老子、庄子为

代表的先秦道家教育，以墨子为代表的先秦墨家教育，都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教育的内容。

秦汉是我国封建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针对战国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采取了简化文字、颁挟书令、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等措施，其目的是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但客观上也促成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统一。秦代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批能服务于秦政的刀笔小吏。语文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和写字。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些书既是进行识字写字教学的课本，又是使文字规范化的字书。

汉代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属中央一级的有太学，教师称博士。属地方的，郡国叫学，县、道、邑、侯国叫校，教师称经师；乡叫庠，聚叫序，教师称孝经师。私学又有不同层次。由经学大儒自立的“精舍”相当于官学中的太学。属于小学程度的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主要任务是学书，这类学校叫书馆，也称学馆，教师称书师；第二阶段是学习《论语》、《孝经》和一些律令文字，私学教师传经的统称经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贤良对策》），设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其时，《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把语文教学看成经学的附庸，是汉代语文教育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三国魏黄初年间曾在洛阳设太学，学生最多达几千人。但是因为“博士选轻，诸生避役”（《三国志·魏志·刘劭传》），所以教学效果并不好。西晋初期教育比较发达，太学之外还有国子学。南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成绩不大。北朝数北魏的官学最发达，国子太学生多的时候有几千人。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由私学和家学承担。私学蒙学教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书馆，其课程主要是识字、写字和算术，教师称为书师；一是乡塾，其课程主要是读一般经书，教师称塾师。家学主要是家人父子传授，如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北魏江式一家的文字学、梁萧统（昭明太子）一家的文学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地位丧失，玄学思潮兴起。以何晏、王弼为首的一批名士，一改支离烦琐、神秘僵化的汉代经术，祖述老庄、辩名析理，以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糅合儒道。他们出言以玄远为高雅，崇尚虚无无为之理，经常群聚辩论，即所谓“清谈”。口语交际因此得到重视，成为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一大特色。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崛起，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儒学，引发了唐代儒学复兴运动。在韩愈等人的倡导下，儒家经学再次成为学校的主要

课程。在经学、古文运动、科举取士等因素的影响下，以文言型书面语言教学为主的古代语文课程体系初步形成。

隋唐五代，蒙学阶段的教育任务主要由私学承担。此时蒙学大致分为村学和乡学，课程主要是识字、写字、算术，偶有读诗。地方官学，设在州县的，课程主要是经学、书学和科考预备；设在乡以下的学校，仍属启蒙性质，课程大体有读诗文、属对和写字等。隋唐五代家学也很盛行，使启蒙教育较此前有了很大的普及。家学主要是识字，也有初步的读文。隋唐学校制度逐步完备。隋特设中央机构国子学（后改国子监）管理教育。唐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六学。门下省设弘文馆，东宫有崇文馆，尚书省祠部有崇玄馆等。地方学校，州设有经学和医学，县设有经学。国子学学生分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除学习专业的经书外，还要兼习《周易》、《尚书》、《公羊》、《穀梁》等。《孝经》、《论语》是公共必修的。学生习经之余，习隶书和《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等。

隋唐，尤其是唐代，书法教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隋代书法融合南北书风，为唐代书法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统治者的提倡，如科举考试中专设明书科、吏部以书判定选等措施，对书法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唐代书法教学渗透在官学和私学中。为使书写正确，符合规范，学生除习书外，还要学《说文》、《字林》、《三仓》、《尔雅》等书。地方官学、私学，学生除了诵习五经，也要学习书法。

宋代一直处于多政权并存的状态，但在其软弱的外交政策下，社会基本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北宋经过三次兴学建立了完整的官学体制，科举制经过兴废改革，基本定型。书院作为教育组织机构在宋代获得蓬勃发展，奠定了后世书院教育的体制。

宋代理学的兴盛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是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在儒、道、佛结合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新儒学，因其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理学”之名。理学以探讨“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存养功夫，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以“学以为圣”为目的，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治国、治家、育人的标准。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加注。《四书》、《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学校的标准课程和教材，并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唯一依据。宋以后学校课程的最大特色就是理学成为学校的主导课程。

元朝是少数民族首次建立的统一政权。其统治者在统一的过程中，认识到加速自身封建化是巩固其统治的唯一出路，因而崇儒兴学，尤其推崇程朱理学，以朱注“四书”为科举内容。元代学校教育制度，基本承袭宋制，并借鉴

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

辽、金办学经验，结合本民族特点，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办学模式。各少数民族也在与汉族的接触中不断“汉化”，纷纷仿效汉制，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创造自己的文字等。

明代教育体制沿袭宋元，没有多大变化。明代官学的教育系统，以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社会学为主体，组成较为完整的学制体系。中央官学主要指南北国子监。南指南京国子监，北指北京国子监。地方官学以府学、州学、县学为主，统称为地方儒学。社会学蒙学。明代官学课程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明代私学主要为蒙馆、家塾。蒙学每天的功课大体有个顺序。如王守仁《训蒙教约》规定：“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

明中期封建统治极度腐败，程朱理学日渐僵化，心学逐步在书院得到传播，并在嘉靖年间达到极盛。心学是在宋明理学内部，作为正宗的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始作俑者是南宋的陆九渊，后经明代的王守仁大力发挥，成为影响一代的学术文化思潮。正德至隆庆年间的书院传授的内容不再是程朱理学，而是以陆王心学为主。此时书院成为学术思想的发源地，成为研究、探讨学问的地方，往往有一些著名人物主讲，讲会之风盛行。这是明代语文教育的一个闪光点。

明代的写作课程，蒙学阶段主要是属对，此后主要是八股文。张志公指出：程式化的作文训练，渊源于唐代的帖经和应举诗。唐代以诗赋取士，作应举诗，有“破题”、“额比”、“颈比”、“腹比”、“后比”、“结尾”等名目。到了宋代，罢诗赋，以经义策论取士，于是作文开始有了程式，逐步有了“冒、原、讲、证、结”和“义头、原题、入腹、引证、结题”等种种说法。大致从宋代起，经元代至明初，训练作文一直采用这种五段的程式。到了明代，程式愈变愈严，愈变愈死，中叶以后，终于演变成为八股文，一直流行到清末，^①最终定型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基本格式。八股文从宋代经义发展而来，也称经义。八股文考题限制在《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内，又称四书文。八股文还有制义、举子业、时文等名称。明清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成为明清写作教学的重要内容。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教育的重要场所，一是官学，一是书院。清代官学承袭明制，仍包括中央、地方与社会学（或义学）三级三类。中央官学为国子监，系贡生与监生学习之处，或称国学或太学。地方官学也沿用明制，按府、州、县及相当于府、州、县的厅设立。清初沿袭明制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1页。

曾一度设立社学，但不久社学就被义学等形式取代了。义学，又称义塾，是明清时期为民间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清代书院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以讲授理学为主的书院，二是以讲授汉学为主的书院，三是以考课为主的书院，四是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书院，五是注重学习西学的书院。清代写作更为重视八股文，八股文的选本较明代更多。

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中，没有独立设置的语文课程，语文教育通常与经学、史学、文学、伦理道德的教育等融为一体，但是，这只能表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始终是言语形式的教学与言语内容的教学融为一体的教育，而不能说明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中没有语文教育。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语文课程的基本内容是先集中识字，然后学习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知识，同时以《文选》等作为阅读教材和写作范本，进行相关的读写训练。

在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许多教育家对语文学科的课程与教学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当时和后世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以乐正克的《学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韩愈的《进学解》、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王守仁的《社学教条》、王筠的《教童子法》、唐彪的《家塾教学法》等最为重要。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这些论著是古代语文教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教育家非常注意将“教”与“学”作为对立面的统一来研究。早在《尚书·说命》中就有“惟教学半”的说法。汉代孔安国传曰：“教，教也。教然后知所困，是以学之半。”从汉代的《学记》到清代的《家塾教学法》，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教学”一词已具有“教”与“学”双方互动的意思。唐彪则将讨论如何“教”的《父师善诱法》与讨论如何“学”的《读书作文谱》合而为《家塾教学法》，表明二者是既各有侧重又不可分割的整体。1919年，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以“教学法”取代当时师范课程中的“教授法”，以便把研究的对象由单独研究教师的“教”，拓展为同时研究学生的“学”，也许正是植根于中国古代教育研究的优良传统。

张志公先生在《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中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学有三大经验：“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也有三大问题：“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教学内容——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一般古文和八股文）。这样的性质和目的，这样的内容，决定了

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

学语文的主要手段——记诵和摹仿。”并由此产生了四大弊端：“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忽视文学教育”、“不重视知识教育”。^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教育也面临着历史的转换：一方面科举愈来愈僵化，教育内容愈来愈空疏；另一方面西学东渐，给当时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1862年，清统治者下令整顿翰林院，要求兼综汉宋，崇尚实学：“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总归为己之学，其有余力及于诗古文词者听之。”^②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新式书院，如1865年由上海地方政府创办的上海龙门书院、1874年徐寿与傅兰雅等人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1876年冯骏光创办的上海求志书院等，均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其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焕纶1878年创办的上海正蒙书院（今上海市黄浦区梅溪小学的前身），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正蒙书院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③，其“国文”为中国学校最早独立设置的语文课程。1897年，张焕纶主持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教务，在南洋公学外院（为南洋公学师范院附属小学）开设“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门课程，其语文课程也以“国文”名之。

1901年，清政府下诏科举“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官学与书院统称学堂。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并经法令正式公布，且在全国推广实行的学制。其中规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均设“读经讲经”等科，此外，初等小学堂还设有“中国文字”科，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则设有“中国文学”科。这里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以及“读经讲经”科，已经具备了后来的以阅读和写作教学为主体的语文教育学科的特征。一般认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及“读经讲经”等科的出现，结束了将语文课程与蒙学教育、经学教育、“六艺”教育等合为一体的历史，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学科の正式诞生。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对清末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中国的语文教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12年1月，教育部宣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初等小

①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55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五十二，同治元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3页。

③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同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将各类学校“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更名为“国文”。这两个文件的颁布，以法令的形式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促进了普通教育的发展。

在五四时期广泛要求“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大背景下，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小学改“国文”为“国语”。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现代白话文终于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开始占领教科书的阵地。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该学制规定小学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1923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已开列出国语、国文课程纲要，内容包括课程目的、作业、教材、教法说明及毕业最低限度标准等等，成为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为依据的、体系较为严整的语文科课程标准。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明确规定小学开设“国语”课，中学开设“国文”课。至此，国语、国文并存的局面正式形成，并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叶圣陶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工作，将新中国小学语文学科的名称正式定名为“语文”，揭开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新的一页。叶圣陶解释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语文教育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重要的事件有：20世纪50年代初期推广《红领巾》教学法，50年代中期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60年代初关于“双基”和“工具性”的讨论，等等。

“文革”结束后至20世纪末，语文教育在语文教学大纲的编制、语文教材的建设、语文教学的改革和语文教育的研究等方面都逐步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颁发了多套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从1986年开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要逐步实行教材编审分开、一纲多本的政策。1986年9月，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

^① 叶圣陶：《答滕万林》，《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

过、准予在全国试用的初中语文教材就有十多种。

自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了贯彻这两个文件精神,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新的课程体系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各科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与新课标配套的新教材也先后出版,新课程于2001年秋季在全国38个国家级实验区进行实验。至2005年秋季义务教育新课程实验区扩大到100%,我国小学、初中起始年级已全部进入新课程。2003年3月,教育部正式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高中15个学科的课程标准。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采取以省为单位整体推进的方式进行,2004年秋季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四省区率先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至2007年秋季江苏、天津、浙江、福建、安徽、辽宁、北京、吉林、黑龙江、陕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均已先后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此外,上海作为教育部批准的独立课程改革实验区,结合该市特点,将高中课程划分为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和研究性课程,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就语文学科而言,新的语文课程强调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作为《语文教师成长丛书》之一种,本书侧重于对中国语文教育史的介绍。我们没有采用通行的以时代为序分章节写作的方式,而是采用了较为灵活的专题的方式,通过20个专题,分别介绍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一些重要史实,并略加评论。我们期望通过本书能使读者了解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概况,能有助于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

目 录

序 言 /1

引 言 /1

上 编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 /1

从甲骨文到“三百千”

——古代识字写字教材与教学 /3

“四书五经”与“文选”

——古代阅读教材与教学 /16

“尺牍”、“属对”与“八股文”

——古代写作教材与教学 /41

《诗经》、《千家诗》与《唐诗三百首》

——古代的诗教 /68

《颜氏家训》、《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与《家塾教学法》

——古代的家教 /86

从白鹿洞书院到龙门书院

——古代的书院教学 /102

中 编 中国现代语文课程 /121

从“国文”到“语文”

——现代语文课程名称的演变 /123

从学堂章程到语文课程标准

——现代语文课程标准的演变 /132

从“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到“工具性”与“人文性”

——现代语文课程性质的论争 /142

读经存废与汉语、文学分合

——现代语文课程设置的论争 /156

汉字存废与语体变更

——现代语文课程内容的论争 /181

从“中国文学教科书”到新课程语文课本

——现代语文课程教材的变迁 /200

下 编 中国现代语文教学 /211

教学程式、教学方法与语感教学的探索

——现代阅读教学的历程 /213

从废除“八股文”说起

——现代写作教学的历程 /235

艰难的言说

——现代口语交际教学的历程 /255

从“暗中摸索”到“明里探讨”

——现代语文知识教学的历程 /269

从“小课堂”到“大语文”

——现代语文课外活动的历程 /279

从“五段教授法实验”说起

——现代语文教改实验述评 /292

从刘廷芳的心理实验说起

——现代语文教学心理的探讨 /317

从陈鹤琴的测试研究到标准化考试的论争

——现代语文教学评价的探索 /329

参考文献 /338

后 记 /345

上 编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